

民国时期影响国人的大师著作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民国时期影响国人的大师著作

梁启超：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梁启超 著 杨佩昌 整理

中国画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 梁启超著；杨佩昌整理. —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10.4

ISBN 978 - 7 - 80220 - 743 - 1

I. ①梁… II. ①梁… ②杨… III. ①学术思想 - 思想史 - 中国 - 清代 IV. ①B249.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53300 号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出 版 人：田辉

责任编辑：梅逸

出版发行：中国画报出版社

(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33 号，邮编：100048)

电 话：88417359 (总编室兼传真) 68469781 (发行部)

88417417 (发行部传真)

网 址：<http://www.zghbcbs.com>

电子信箱：cpbh1985@126.com

印 刷：三河德利印刷厂

监 印：敖 晔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00mm × 1000mm 1/16

印 张：16

版 次：2010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80220 - 743 - 1

定 价：19.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导 言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等，广东新会人。他自小就十分聪明，勤奋好学。他4岁就开始学习写字，读《四书》、《五经》，8岁就会写千字文章。别人在科举路上跌跌撞撞，梁启超却走得很顺，12岁中秀才，17岁中举人，只是在会试时莫名其妙地栽了个大跟头。当时，乡里人都称他是“神童”。

1890年，梁启超赴京会试，不中。返乡路经上海，看到介绍世界地理的《瀛环志略》和上海机器局所译西书，眼界大开。同年结识康有为，投其门下，从此人生道路发生了巨大转变。二人见面之后，聊了好几个时辰，梁启超后来追忆这段往事时说，康有为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佛教用来形容佛祖说法时的词语），当头棒喝之后，使他一时不知所措，以前所学的不过是应付科举考试的敲门砖而已，根本不是什么学问。于是退出以前求学的学海堂，拜康有为为师。从此，在康有为的引导下，梁启超尽舍训诂之学，接受康有为的维新变法思想与政治主张，逐渐成长为康有为的左膀右臂，史称“康梁”。变法之前，梁启超的主要见解皆来自于康有为，梁启超用他那充满感情的笔，阐发康有为杂乱、高深的思想，从而使“君主立宪”深入人心。

1895年春，梁启超再次赴京会试，时值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群情激愤。梁启超协助康有为，发动在京应试举人联名请愿的“公车上书”，要求清廷拒和、迁都、实行变法。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表现活跃，曾主北京《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和上海《时务报》笔政，又赴澳门筹办《知新报》，在鼓动舆论、宣传维新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他的许多政论激昂慷慨，文笔流畅，笔锋常带感情，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

1897年，梁启超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湖南宣传变法思想。1898年回京，积极参加“百日维新”，受光绪帝召见，奉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赏六品衔，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变法失败后，清廷通缉他，梁启超被

迫亡命日本，开始旅居海外13年的流亡生活。但梁启超很快从变法失败后的阴影中走出来，先后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传播西方文化，执论界之牛耳。

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仿行宪政”，梁启超立即表示支持。1907年10月，在东京建立“政闻社”，期望推动清政府实行君主立宪。由于清政府并不真心实行宪政，政闻社也因受到查禁而宣告解散。

武昌起义爆发后，梁启超一度宣扬“虚君共和”，试图使革命派与清政府妥协。民国初年又支持袁世凯，并承袁意，将民主党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改建进步党，与国民党争夺政治权力。

1913年，进步党“人才内阁”成立，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野心日益暴露，梁启超反对袁氏称帝。1915年8月，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进行猛烈抨击，旋与蔡锷策划武力反袁。1915年底，护国战争在云南爆发。1916年，梁启超赴两广地区，积极参加反袁斗争，为护国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袁世凯死后，梁启超依附段祺瑞。他拉拢一些政客，组建宪政研究会，与支持黎元洪的宪政商榷会对抗。1917年7月，段祺瑞掌握北洋政府大权。梁启超拥段有功，出任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9月，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11月，段内阁被迫下台，梁启超也随之辞职，从此退出政坛。

1918年底，梁启超赴欧，亲身了解到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同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工农运动的兴起，也使其深感不安。回国之后，即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

1920年后，梁启超先后在清华学校、南开大学等校执教，并到各地讲学，深受欢迎，“每逢上课，不但教室座无虚席，而且走廊、过道、门外都挤满了学生。”他还担任过京师图书馆馆长、北京图书馆馆长、司法储才馆馆长等职，为培养人才和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一定成绩。1929年1月19日，他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

梁启超不仅一生以天下为己任，而且非常注重教育子女，也要求他们有益于社会和国家。在梁启超的教育下，他的九个子女个个成为国家栋梁。其中，长子梁思成、次子梁思永和最小的儿子梁思礼都是院士。梁启超家出了三个院士，在中国绝无仅有！

梁启超不仅是中国近代重要的思想家、政治活动家，而且也是一位著名学

者。他兴趣广泛，学识渊博，在文学、史学、哲学、佛学等诸多领域，都有较深的造诣。梁启超一生热衷于政治，但始终没有找到正确的政治道路。他一生又热衷于文化学术，在文化学术上的业绩，远远超过政治上的成就。特别是欧游归来之后，以主要精力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写下了许多重要著作和大量文章，其中不少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就是其中的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该书是梁启超晚年的一部学术著作，写于1923年至1925年春，原是他南开大学和清华大学讲授中国学术而编写的讲义，后整理成书，于1926年由上海民志书店正式出版。

提到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不能不提他的另一部清代学术史著作，撰成于1920年的《清代学术概论》。《清代学术概论》原是梁启超为好友蒋方震《欧洲文艺复兴史》所写序言，因长达5万余字，遂单独成书。《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延续了《清代学术概论》的思路，从“时代思潮”、“复古求解放”等理念入手，在哲学和思想层面进一步展开剖析，可称《概论》的姊妹篇。《概论》精炼概括，侧重于“论”，被视为纵论清代学术的一部纲领性著述。《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则侧重于“史”，以16讲、26万字的翔实内容，讲述明朝末年至中华民国初年（1623~1923）中国学术思想的变迁史，论述了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清初各学派建设及主要学者成就、清代学者整理旧学的总成绩三个大问题。在他那“常带感情”的笔锋下，百余位学者的学术成就与论著精要被深入浅出地娓娓道来。纵横并立、经纬互持的布局中，清代经学、小学、音韵学、校注古籍、辨伪书、辑佚书、史学、方志学、地理学、谱牒学、历算学、乐曲学、其他科学等20个学术门类的成就及各学科概貌得到清晰的评述和勾划。

梁启超在书中提出，著学术史有四个必要的条件：一、须把那时代主要各学派全数网罗，不可以爱憎为去取；二、须将其特点提掇出来，令读者有很明晰的观念；三、要忠实传写各家真相，勿以主观上下其手；四、要把各人的时代和他一生经历大概叙述，看出那人的全人格。作者在本书的《反动与先驱》和《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等节中，“先提掇大势”，概括300年学术发展的总趋势，认为这个“时代思潮”是对宋元明三朝“明心见性”“道学”的批判；是再开一个更切实更伟大时代的“先驱”；这个时代的“学术主潮是，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其“支流是，排斥理论提倡实践”。他认为这个时期学术思想的发展，是从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为代表的舍空谈而趋实践的经世致用之学，到脱离“时政”的乾隆嘉庆时期的考据学，再到

道光咸丰以后兴起的至晚清以变法维新的“经世致用”、“托古改制”为特点的近代今文经学。作者看到了一些学术思想本身发展的脉络，并着重指出这种变迁是受“明亡清兴”、清王朝统治加强、“经过屡次文字狱”、“社会日趋安宁”、清王朝走向衰落、“政府箝制的威权也陵替”、人们起来和恶制度拼命的政治形势的影响。

梁启超的这本《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语言亲切，像是一个朋友在和我们谈话，对于学林掌故，娓娓道来，加上他那支“有魔力”的笔，以及他广博的知识和敏锐的思维，真可谓最佳中国传统学术入门书了。他写成此书，距今已经 80 多年了，却一点儿也没有褪色，反而随着传统文化重新受到重视，而愈发重要。原因无他，在于他对于中国文化深深的挚爱。

本篇导言参考了大量文献，引用了许多专家的文字，在这里表示衷心的感谢。

目 录

一 反动与先驱	3
二 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上)	10
三 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中)	15
四 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下)	20
近三百年学术史附表	
五 阳明学派之余波及其修正	34
——黄梨洲 附:孙夏峰李二曲	
余姚王学家 李穆堂	
六 清代经学之建设	43
——顾亭林 阎百诗 附:胡毗明 万充宗	
七 两畸儒	58
——王船山 朱舜水	
八 清初史学之建设	66
——万季野 全谢山	
附:初期史学家及地理学家	
九 程朱学派及其依附者	74
——张杨园 陆桴亭 陆稼书 王白田	
附:其他	
十 实践实用主义	80
——颜习斋 李恕谷	
附:王昆绳 程绵庄恽皋闻 戴子高	
十一 科学之曙光	102
——王寅旭梅定九 陈资斋 附:其他	

十二	清初学海波澜余录	109
十三	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一)	128
	——经学 小学及音韵学	
十四	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二)	159
	——校注古籍 辨伪书 辑佚书	
十五	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三)	189
	——史学 方志学 地理学及谱牒学	
十六	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四)	230
	——历算学及其他科学 乐曲学	

梁启超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一 反动与先驱

这部讲义，是要说明清朝一代学术变迁之大势及其在文化上所贡献的分量和价值。为什么题目不叫做清代学术呢？因为晚明的二十多年，已经开清学的先河，民国的十来年，也可以算清学的结束和蜕化。把最近三百年认做学术史上一个时代的单位，似还适当，所以定名为《近三百年学术史》。

今年是公历 1923 年。上溯三百年前至 1623 年，为明天启三年，这部讲义就从那时候讲起。若稍为概括一点，也可以说是 17、18、19 三个世纪的中国学术史。

我三年前曾做过一部《清代学术概论》。那部书的范围和这部讲义差不多，但材料和组织很有些不同。希望诸君预备一部当参考。

这个时代的学术主潮是：

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

无论何方面之学术，都有这样趋势。可惜客观考察多半仍限于纸片上事物，所以它的效用尚未能尽量发挥。此外还有一个支流是：

排斥理论，提倡实践。

这个支流屡起屡伏，始终未能很占势力。总而言之，这三百年学术界所指向的路，我认为是不错的——是对于从前很有特色而且有进步的，只可惜全部精神未能贯彻。以后凭藉这点成绩扩充蜕变，再开出一个更切实更伟大的时代，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这回演讲的微意。

凡研究一个时代思潮，必须把前头的时代略为认清，才能知道那来龙去脉。本讲义所讲的时代，是从它前头的时代反动出来。前头的时代，可以把宋元明三朝总括为一个单位——公历 1000 至 1600——那个时代有一种新学术系统出现，名曰“道学”。那六百年间，便是“道学”自发生成长以至衰落的全时期。那时代的道学思潮又为什么能产生能成立呢？（一）因为再前一个时代便是六朝隋唐，物质上文化发达得很灿烂，建筑、文学、美术、音乐等等都呈现历史以来最活泼的状况。后来，这种文明烂熟的结果，养成社会种种惰气。自唐天

宝间两京陷落，过去的物质文明已交末运，跟着晚唐藩镇和五代一百多年的纷乱，人心愈发厌倦，所以人到宋朝，便喜欢回到内生活的追求，向严肃朴素一路走去。（二）隋唐以来，印度佛教各派教理尽量输入，思想界已经搀入许多新成份，但始终儒自儒、佛自佛，采一种不相闻问的态度。到了中晚唐，两派接触的程度日渐增加，一方面有韩愈一流人据儒排佛，一方面有梁肃、李翱一流人援佛入儒。（注一）到了两宋，当然会产出儒佛结婚的新学派。加以那时候的佛家，各派都衰，禅宗独盛。禅宗是打破佛家许多形式和理论，专用内观工夫，越发与当时新建设之道学相接近，所以道学和禅宗，可以说是宋元明思想全部的代表。

（注一）梁肃与白居易交好，是天台宗一员，护法健将。李翱是韩愈朋友，著有《复性书》，拿佛理解释儒书。

道学派别，虽然不少，但有一共同之点，是想把儒家言建设在形而上学——即玄学的基础之上。原来儒家开宗的孔子不大喜欢说什么“性与天道”，只是想从日用行为极平实处陶养成理想的人格。但到了佛法输入以后，一半由儒家的自卫，一半由时代人心的要求，总觉得把孔门学说找补些玄学的作料才能满足。于是从“七十子后学者所记”的《礼记》里头拾出《大学》、《中庸》两篇出来，再加上含有神秘性的《易经》作为根据，来和印度思想对抗。“道学”最主要的精神实在于此。所以在“道学”总旗帜底下，虽然有吕伯恭、朱晦庵、陈龙川各派，不专以谈玄为主，然而大势所趋，总是倾向到明心见性一路，结果自然要像陆子静、王阳明的讲法，才能彻底地成一片段。所以到明的中叶，姚江（王阳明）学派，奄袭全国，和佛门的禅宗，混为一家。这是距今三百五六十年前学术界的形势。

在本讲义所讲的时代开始之时，王阳明去世已将近百年了。（阳明卒于嘉靖八年，当公历1529年。）明朝以八股取士，一般士子，除了永乐皇帝钦定的《性理大全》外，几乎一书不读。学术界本身，本来就像贫血症的人，衰弱得可怜。王阳明是一位豪杰之士，他的学术像打药针一般，令人兴奋，所以能做五百年道学结束，吐很大光芒。但晚年已经四方八面受人妒忌排挤，不得志以死。阳明死后，他的门生，在朝者，如邹东廓守益、欧阳南野德；在野者，如钱绪山德洪、王龙溪畿、罗近溪汝芳、王心斋艮，都有绝大气魄，能把师门宗旨发挥光大，势力笼罩全国，然而反对的亦日益加增。反对派别，大略有三：其一，事功派，如张江陵居正辈，觉得他们都是书生迂阔，不切时务。其二，文学派，如王弇州世贞辈，觉得他们学问空疏，而且所讲的太干燥无味。其三，势利派，毫无宗旨，唯利是趋，依附魏忠贤一班太监，专和正人君子作对，对于讲学先生，自然疾之如仇。这三派中，除势利派应该绝对排斥外，事功、文学两派，本来都各有好处。但他们既已看不起道学派，道学派也看不起他们，由相轻变为相攻。结果这两派为势利派利用，隐然成为三角同盟以对付道学派。中间经过“议礼”、“红丸”、“挺击”、“移宫”诸大案，（注二）都是因宫廷中一种不

相干的事实，小题大做，双方意见闹到不可开交。到最后二三十年间，道学派大本营，前有“东林”，后有“复社”，都是用学术团体名义，实行政党式的活动。他们对于恶势力，拼命奋斗的精神，固然十分可敬可佩，但党势渐成以后，依草附木的人日多，也不免流品很杂。总而言之，明朝所谓“士大夫社会”，以“八股先生”为土台。所有群众运动，无论什么“清流浊流”，都是八股先生最占势力。东林、复社，虽比较的多几位正人君子，然而打开天窗说亮话，其实不过王阳明这面大旗底下一群八股先生和魏忠贤那面大旗底下一群八股先生打架。何况王阳明这边的末流，也放纵得不成话，如何心隐本名梁汝元、李卓吾等辈，简直变成一个“花和尚”。他们提倡的“酒色财气不碍菩提路”，把个人道德社会道德一切藩篱都冲破了，如何能令敌派人心服。这些话且不必多说。总之晚明政治和社会所以溃烂到那种程度，最大罪恶，自然是在那一群下流无耻的八股先生，巴结太监，鱼肉人民。我们一点不能为他们饶恕。却是和他们反对的，也不过一群上流无用的八股先生，添上几句“致知格物”的口头禅做幌子，和别人闹意见闹过不休。最高等的如颜习斋所谓“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至矣极矣。当他们笔头上口角上吵得乌烟瘴气的时候，张献忠、李自成已经把杀人刀磨得飞快，准备着把千千万万人砍头破肚，满洲人已经把许多降将收了过去，准备着看风头捡便宜货入主中原。结果几十年门户党派之争，闹到明朝亡了一齐拉倒。这便是前一期学术界最后的一幕悲剧。

（注二）欲知四大案简单情节，看赵翼的《廿二史札记》最好。

明亡以后，学者痛定思痛，对于那群阉党、强盗、降将，以及下流无耻的八股先生，罪恶滔天，不值得和他算账了。却是对于这一群上流无用的道学先生，倒不能把他们的责任轻轻放过，李刚主说：

“……高者谈性天，撰语录；卑者疲精死神于举业，不唯圣道之礼乐兵农不务，即当世之刑名钱谷，亦懵然罔识，而搦管呻吟，自矜有学。……中国嚼笔吮毫之一日，即外夷秣马厉兵之一日，卒之盗贼蜂起，大命遂倾，而天乃以二帝三王相传之天下授之塞外……”《恕谷集·书明刘户部墓表后》

又说：

“宋后，二氏学兴，儒者浸淫其说，静坐内视，论性谈天，与夫子之言，一一乖反，而至于扶危定倾大经大法，则拱手张目，授其柄于武人俗士。当明季世，朝庙无一可倚之臣。坐大司马堂批点《左传》，敌兵临城，赋诗进讲，党建功立名，俱属琐屑，日夜喘息著书，曰此传世业也。卒至天下鱼烂河决，生民涂炭。呜呼，谁生厉阶哉！”《恕谷集·与方灵皋书》

朱舜水说：

“明朝以时文取士。此物既为尘羹土饭，而讲道学者又迂腐不近人情。……讲正心诚意，大资非笑，于是分门标榜，遂成水火，而国家被其祸。”
《舜水遗集·答林春信问》

顾亭林说：

“刘、石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遗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辞其末。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昔王衍妙善玄言，自比子贡，及为石勒所杀，将死，顾而言曰：‘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今之君子，得不有愧乎其言。”《日知录》卷七《夫子之言性与天道》

亭林既愤慨当时学风，以为明亡实由于此，推原祸始，自然责备到阳明。他说：

“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风至于有百余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衍）之清谈、王介甫（安石）之新说；其在于今，则王伯安（守仁）之良知是也。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拨乱世反诸正，岂不在后贤乎？”《日知录》卷十八

王船山亦以为王学末流之弊，从阳明本身出来。他说：

“姚江王氏阳儒阴释诬圣之邪说，其究也，刑戮之民、阉贼之党皆急附焉，而以弃其‘无善无恶圆融事理’之狂妄。”《正蒙注·序论》

费燕峰说：

“清谈害实，始于魏晋，而固陋变中，盛于宋南北。案：费氏提倡‘实’与‘中’两义，故斥当时学派为害实变中。自汉至唐，异说亦时有，然士安学同，中实尚属。至宋而后，齐逞意见，专事口舌，……又不降心将人情物理平居处事点勘离合，说者自说，事者自事，终为两断。一段好议论，美听而已。……后儒所论，唯深山独处，乃可行之；城居郭聚，有室有家，必不能也。盖自性命之说出，而先王之三物六行亡矣。……学者所当痛心，而喜高好僻之儒，反持之而不下。无论其未尝得而空言也，果‘静极’矣，‘活泼泼地会’矣，‘坐忘’矣，‘心常在腔子里’矣，‘即物之理无不穷，本心之大无不立，而良心无不致’矣，亦止与达摩面壁、天台止观同一门庭。……何补于国？何益于家？何关于政事？何教于民生？

……学术蛊坏，世道偏颇，而夷狄寇盗之祸亦相挺而起。……”《费氏遗书·弘道书》卷中

平心而论，阳明学派，在二千年学术史上，确有相当之价值，不能一笔抹杀，上文所引诸家批评，不免都有些过火之处。但末流积弊，既已如此，举国人心对于他既已由厌倦而变成憎恶，那么这种学术，如何能久存？反动之起，当然是新时代一种迫切的要求了。

大反动的成功自然在明亡清兴以后。但晚明最末之二三十年，机兆已经大露，试把各方面的趋势一一指陈。

第一，王学自身的反动。最显著的是刘截山宗周一派，截山以崇祯十七（1644）年殉难特标“证人”主义，以“慎独”为入手，对于龙溪王畿、近溪罗汝芳、心斋王艮诸人所述的王学，痛加针砭，总算是舍空谈而趋实践，把王学中谈玄的成份减了好些。但这种反动，当然只能认为旧时代的结局，不能认为新时代的开山。

第二，自然界探索的反动。晚明有两位怪人，留下两部怪书。其一为徐霞客，名宏祖，生万历十三（1585）年，卒崇祯十三（1640）年，年56。是一位探险家，单身步行，把中国全部都游历遍了。他所著的书，名曰《霞客游记》，内中一半虽属描写风景，一半却是专研究山川脉络，于西南——云、桂、蜀、贵地理，考证极为详确。中国实际调查的地理书，当以此为第一部。（注三）其二为宋长庚，名应星，奉新人，卒年无考，丁文江推定为卒于顺治、康熙间。是一位工业科学家。他所著有两部书，一部是《画音归正》。据书名当是研究方音，可惜已佚；一部是《天工开物》，商务印书馆正在重印用科学方法研究食物、被服、用器，以及冶金、制械、丹青、珠玉之原料工作，绘图贴说，详确明备（注四）。这两部书不独一洗明人不读书的空谈，而且比清人专读书的实谈还胜几筹，真算得反动初期最有价值的作品。本条所举，虽然不过一两个人一两部书，不能认为代表时代，然而学者厌蹈空喜踏实的精神，确已渐渐表现了。

（注三）潘稼堂（宋）《徐霞客游记序》云：“霞客之游，在中州者无大过人，其奇绝者，闽粤楚蜀滇黔百蛮荒徼之区，皆往返再四。其行不从官道，……先审视山脉如何去来，水道如何分合，既得大势，然后支搜节讨。”又云：“沿溯澜沧、金沙，穷南北盘江之源，实中土人创辟之事。……向来山经地志之误，厘正无遗，……然未尝有怪迂侈大之语，欺人以所不知。”

（注四）《天工开物》自序云：“世有聪明博物者，稠人推焉。乃枣梨之花未赏，而臆度楚萍；釜鬲之范鲜经，而侈谈莛鼎。画工好图鬼魅而恶犬马，即郑侨晋华，岂足为烈哉！”丁在君（文江）《重印（天工开物）始末记》云：“三百年前言工业天产之书，如此其详且明者，世界之中，无与比伦。”

第三，明末有一场大公案，为中国学术史上应该大笔特书看，曰：欧洲历算学之输入。先是马丁·路得既创新教，罗马旧教在欧洲大受打击，于是有所谓“耶稣会”者起，想从旧教内部改革振作。他的计划是要传教海外，中国及美洲实为其最主要之目的地。于是利马窦、庞迪我、熊三拔、龙华民、邓玉函、阳玛诺、罗雅谷、艾儒略、汤若望等，自万历末年至天启、崇祯间先后入中国。中国学者如徐文定，名光启，号元扈，上海人，崇祯六（1633）年卒，今上海徐家汇即其故宅。

李凉庵名之藻，仁和人。等都和他们来往，对于各种学问有精深的研究。先是所行“大统历”，循元郭守敬“授时历”之旧，错谬很多。万历末年，朱世堦、邢云路先后上疏指出他的错处，请重为厘正。天启、崇祯两朝十几年间，很拿这件事当一件大事办。经屡次辩论的结果，卒以徐文定、李凉庵领其事，而请利、庞、熊诸客卿共同参预，卒完成历法改革之业。此外中外学者合译或分撰的书籍，不下百数十种。最著名者，如利、徐合译之《几何原本》，字字精金美玉，为千古不朽之作，无用我再为赞叹了。其余《天学初函》、《崇祯历书》中几十部书，都是我国历算学界很丰厚的遗产。又《辨学》一编，为西洋论理学输入之鼻祖。又徐文定之《农政全书》六十卷，熊三拔之《泰西水法》六卷，实农学界空前之著作。我们只要肯把当时那班人的著译书目一翻，便可以想见他们对于新知识之传播如何的努力。只要肯把那个时代的代表作品——如《几何原本》之类择一两部细读一过，便可以知道他们对于学问如何的忠实。要而言之，中国知识线和外国知识线相接触，晋唐间的佛学为第一次，明末的历算学便是第二次。中国元代时和阿拉伯文化有接触，但影响不大。在这种新环境之下，学界空气，当然变换，后此清朝一代学者，对于历算学都有兴味，而且最喜欢谈经世致用之学，大概受利、徐诸人影响不小。（注五）

（注五）当时治利、徐一派之学者，尚有周子愚、瞿式耜、虞淳熙、樊良枢、汪应熊、朱天经、杨廷筠、郑洪猷、冯应京、王汝淳、周炳谟、王家植、瞿汝夔、曹于汴、郑以伟、熊明遇、陈亮采、许香臣、熊士旂等人，皆尝为著译各书作序跋者。又莲池法师，亦与利玛窦往来，有书札见《辨学遗牍》中。可想见当时此派声气之广。

第四，藏书及刻书的风气渐盛。明朝人不喜读书，已成习惯，据费燕峰密所说：“《十三经注疏》除福建版外，没有第二部。”见《弘道书》卷上固陋到这程度，实令人吃惊。但是，到万历末年以后，风气渐变了。焦弱侯名铉，江宁人，万历四十八（1620）年卒。的《国史经籍志》，在目录学上就很有相当的价值。范尧卿名钦，鄞县人创立天一阁，实为现在全国——或者还是全世界——最古最大的私人图书馆。可惜这个图书馆到民国以来已成了空壳子了。毛子晋名晋，常熟人和他的儿子斧季胤，他们家的汲古阁专收藏宋元刻善本，所刻《津逮秘书》和许多单行本古籍，直到今日，还在中国读书界有很大价值。这几位都是明朝最后二三十年间人。毛斧季是清朝人他们这些事业，都可以说是当时讲学的反动。焦弱侯也是王学家健将，但他却好读书。这点反动，实在是给后来学者很有益的工具。例如黄梨洲、万九沙、全谢山都读天一阁藏书。汲古阁刻本书，流布古籍最有功，且大有益于校勘家。

第五，还有一件很可注意的现象，这种反动，不独儒学方面为然，即佛教徒方面也甚明显。宋、元、明三朝，简直可以说除了禅宗，别无佛教。到晚明忽然出了三位大师：一莲池，名祜宏，万历四十三（1615）年卒二憨山，名德清，天启三（1623）年卒三藕益。名智旭，顺治九（1655）卒我们试把《云栖法汇》莲池著、《梦游集》憨山著、《灵峰宗论》藕益著一读。他们反禅宗的精神，到处都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提倡的是净土宗。清朝一代的佛教一直到杨仁山为止，走的都是这条路。